

1305-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内部发行)

鲤
城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5148/30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泉州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泉州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1.60元

编辑凡例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例，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泉州市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地方史时的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戊戌政变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华侨、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与订正。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目 录

海疆学校革命活动忆述·····	倪章珪 (1)
泉州电灯公司护厂斗争纪述·····	王大毅 陈继业 (17)
原国民党陆军三二五师起义的过程 ·····	洪应百执笔 (23)
陈言廉的军事生活·····	黄玉真 (37)
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纪要·····	蔡若水 (45)
泉州培元学校校史·····	陈朝卿整理 (70)
张炳铭的教育精神和社会活动·····	陈呈芳 (95)
泉州首届运动会记·····	陈允敦 (110)
福建省第三绥靖区军民联合运动大会概况 ·····	程嘉瑞 (116)
感光化学工业的先驱——曾竹仪·····	(128)
林骚及其诗歌·····	薛俊安 (133)
泉州刺绣行业话古今·····	周海宇 林建平 (151)
温陵名匾记·····	陈允敦 (158)
许卓然1916年为福建下游 护国军政大总统呈文·····	陈长河 (178)
泉州旧报刊资料选编 (一) ·····	王连茂整理 (182)

海疆学校革命活动忆述

倪 章 珩

海疆学校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国府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一所专科学校，于1944年创办並招生，至1945年春才临时在仙游县城开学上课。同年秋迁至南安九都，1946年秋迁到泉州。我们的同学是从福建广东各地经考试录取汇合来的。那时，我们部分同学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活动。本文所提到的事实经过，大部分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並和几位有关同学以及刘独峰老师共同回忆，现将一些情况分述如下：

追求进步 探索真理 听到党的声音

我们是第一届学生，那时的青年学生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经常在一起的一些同学，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思想，热爱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面对日寇侵略，时刻感到有国破家亡的威胁，迫切希望中华民族能出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局面，而身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社会里，如何才能找到光明的道路，常常是这些人自发的、迫切的共同探索的问题。因此，都比较注意寻找各种比较有意义的书刊阅读。开始时，分别阅读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哲学和社会科学

的书籍。以后得到了几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著作（当时要得到这类书是非常之难），並逐渐转向大力集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有的同学则着重学习革命文艺和写一些文艺作品。那时我们这些人普遍关心时局，注意社会动态，喜欢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大谈国事。我们对当时国统区的社会政治腐败情况十分憎恶，爱发表言论，抨击时弊，意识深处总以为大声疾呼就可以唤醒大众，促使社会进步，争取民主和光明，以为这是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懂得旧中国为什么那么黑暗，不懂得阶级斗争的道理，不懂得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更不懂得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入学以后，我不住法商科学生宿舍，而和师范科的进步同学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如何探索真理，同时每谈起国事，就痛斥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那时陈英才同学透露他入学前就和地下党有关系，並暗示他是共产党员。他爱好文艺，自称是属于左联文艺思想的。因他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虽然我们也觉得他有爱出风头等的毛病，但在当时条件下，他自然地在进步学生中成为较为突出的人物。当时，周乔林同志（属东江党组织）和一些进步同学在政治上和学习上都很融洽，经常谈心。周了解到我们这些人的学习活动情况，常给予肯定和鼓励。陈英才向周乔林表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交待周要严格保密。开始为避免引

起敌人的注意，只由周与他联系，不让其他人去找他。他还告诉周，上级有人来，他都会将我们的情况汇报，並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关心。周乔林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有一次，陈通过周告诉我们说：“书不必读得太多，多读一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可以了。”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提出毛主席的书弄不到，他答复：“以后看情况解决。”在白色恐怖下，为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革命者的安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除周乔林同学和我接头之外，其他同学均不知道他的身份。

听到党的声音，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学习的方向性也明确，就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有关著作。学校迁到九都后，我们得到了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华南局所属的党刊《正报》等革命书刊。当时接到这些书后都各自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认真阅读。

1945年秋，另一个地下党员由吴序阳同学联系了蔡舜生、林培材、林锦池等广东籍的十多位同学，也在秘密地努力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我和周乔林分别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时，我们的学习伙伴增多了，队伍逐渐壮大了。

学生大罢课

1945年秋，开学不久，学校当局决定“法商科学

生不发给校服”，引起了法商科学生强烈的不满，这是展开斗争的寻火线。开始我们先通过学生自治会多次和学校当局谈判无结果。即在学生自治会主席方武兴等人和陈英才的组织策动下，发动了罢课斗争。罢课前经过充分酝酿，并争取师范科学生同时举行同情罢课（那时五年制师范科学生有个别同学对举行同情罢课有犹豫）。斗争很快由校服问题发展到揭露学校贪污伙食问题，并揪斗总务主任。斗争继续在发展，学生的斗争情绪愈来愈高涨，每天晚上都贴出大量的标语，开始是鼓动学生坚持罢课，逐渐转为以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大约在罢课后第二周，一些同学还办了墙报（约出过三期），贴在礼堂里孙中山先生遗象下，我看到有一期的内容大意是：颂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业绩，指出现在出了不肖子孙（指国民党及动派）祸国殃民，葬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若在天有灵，应严惩这些不肖子孙等等。

当局对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大施压力，还传说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动用警察来镇压罢课学生。学生自治会和广大学生都顶着这股压力坚持罢课，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教职员中也有些是同情学生的。教务长黄玉树以中间者身份多次调停失败，罢课坚持三星期以上，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罢课的事态已成为全校师生注意的中心，最后由教务长黄玉树提出折中方案，答应一

些对学生稍为有利的条件，学生方面也觉得差不多了，经学生会普遍征求同学的意见后，才接受调停复课。这次罢课对校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学校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的团结斗争，也由于国民党的无能，而教职员一般不肯和学生作对，复课后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松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不加干涉，大部分同学很少到教室上课，有的在自学各种专业知识，而我们这些同学则利用时间在学习马列主义论点的各种著作。

复课后，校内外都很平静，到寒假，学校秘密开除陈英才和学生会主席方武兴等三人，通知直接发到他们家里，不敢在学校内公布。

重庆谈判期间校园里政治空气活跃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消息传来，海疆学校校园内政治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在谈判期间，国民党的报刊虽极力封锁谈判的消息，但对各民主党派的报刊却难以完全控制。这时，各种进步刊物如《群众》、《周报》、《民主》、《文萃》等，经各种渠道不断地寄到学校来。这些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批判反动派的顽固立场。这些进步刊物谁拿到手，就先在自己的友好中争相传阅，师生们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这时我们这些同学中已有一部分人在极其秘密的

情况下阅读了党的文件。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革命信心。

当时学校中同学们普遍在谈论政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的人明显增多。那时学校里师生员工中的共产党员人数虽很少，但进步和倾向进步的，原来处于中间状态以及落后状态而向左转的，以及在学术上属于资产阶级理论观点，政治上逐渐趋向拥护革命的，这些人所形成的进步力量，在学校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广大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国民党反动势力受到鄙弃。进步同学议论着：如果能真的实现民主选举，不超过两届，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全部落选。这时，在学校里的反动派垂头丧气，龟缩在阴暗角落里。

不久，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反动派在各地又嚣张起来了，所有的革命刊物全部被禁止。校园内又笼罩着阴沉沉的乌云，全省各地和全国一样都出现了抓人、杀人、抄抢焚毁进步书刊等反革命事件。但是，在谈判期间，穿过重重封锁线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和民主进步的气息，激励着青年革命者的斗志，更加奋勇前进。

“求知读书会”的活动

1945年春，学校在仙游的时候，我们这些常在一起的同学就考虑组织一个读书会，但因人数少，同学

之间又缺乏相互了解，结果没组成。1946年春，陈英才被开除以后，我们有些同学有孤立感，希望能将一些进步同学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时，广东籍同学倡议组织读书会，经过酝酿，大家一致同意，并初步定名为“求知读书会”，不起草章程，用口头协议。凡参加读书会的都必须全力阅读马列主义理论观点的书刊，会员中在学习上必须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互相交换阅读自己的藏书，要写文章等等，并欢迎愿意阅读进步书籍的同学来参加读书会。这时参加学习的有福建广东籍同学二、三十人，还商请陈昭桐、刘独峰两位教授指导读书，并向读书会同学讲过课。

读书会酝酿要定期出学习墙报，这件事曾几种不同意见：一部分同学认为写文章只作纯理论探讨，不联系实际；另一部分同学认为写文章应联系实际，抨击时弊才有意义；一些同学认为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各地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不宜太暴露，又有一些同学认为作理论学习和研究没有问题。虽经反复磋商，意见仍不一致，读书会还没有酝酿领导机构就解体了。以后大家各自学习，没出学习墙报，只在学习上保持某些联系。

在我们找到地下党组织后，泉中心县委领导人许集美、郑家玄两同志都指示要争取广东籍的这一部分进步的同学。许集美同志还为此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我

带给这些同学阅读。阅读过的同学均表示接受，但多数还是坚持只作纯理论学习，也有的认为他们毕业后要回广东，联系不方便，就没参加泉州地区的地下党。

“求知读书会”虽没能加强组织巩固起来，但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

“学生书店”的革命活动情况

由于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和刘独峰副教授有较多的来往，他写过很多文章，有许多稿费不能兑现，后由立达书店拨给他相当数量的书抵偿他的稿费。这些书大部分是进步书刊，刘先生想开书店卖书，得到读书会全体同学的支持。为增加进步书刊的品种和数量，刘先生在暑假前到香港和在《华商报》工作的刘思慕同志联系，并要求他帮助，于是得到香港进步出版界的大力支持。刘先生香港之行，为革命书刊的流通和传播增添了一条渠道，我们很珍视这一行动。从此，香港出版界相继寄来了大批各类革命书刊：有我们党的公开文件；有多种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其中许多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也有我国革命理论家的著作；有革命文艺；有许多革命报刊，如《群众》、《民主》、《文萃》和《经济导报》等。这些书刊中，有极为重要的革命著作：如未署名的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英文本的毛泽东

同志《论联合政府》等，这些均公开上架出售。还有如《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全部是登载新华社电讯及革命性很强的报纸《华商报》，这些是不能公开销售的，就放在柜台下偷偷销售和赠送。读书会的同学负责从书店的筹备、进货、验收、入库、上架到轮流来书店当义务店员卖书等工作（书店没雇用店员）。刘先生原想把书店命名为“民主书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觉得民主二字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的，最后采纳吴序阳同学的意见定名为“学生书店”。

在国民党反动派重重的封锁下，“学生书店”尽自己的可能大量销售各种进步书刊，起了传播革命思想、革命信息的作用，就好象苦旱逢甘雨，它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前往购书的人非常之多。由于大量进货，又很快就销售出去，致使有许多书目连刘独峰先生本人也来不及过目。就我们所知，国民党统治下的泉州，象这样大量销售革命书刊是很少见的。

“学生书店”如此大量销卖进步书刊，应当说是刘先生和读书会的同学对泉州人民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学生书店”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起了大量传播革命思想、革命信息的作用，对社会有很大的震动，也惊动了国民党设在闽南的特务机关。据闻有的特务头子要立即下手抓人，但有的特务头子怕贸然下手会

引起社会反对。海疆学校是当时泉州地区的唯一的高等学校，它的学生已经受到社会的相当器重，而刘先生是教授，要逮捕这些人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反动派正是有慑于此，才改变手法，通过刘先生的一个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做事的同乡，通知刘先生要立即烧毁进步书刊，不准学生再到书店，否则将要下手。刘独峰先生立即通知我们：特务已在注意学生书店了，叫我们这些同学不要再到学生书店。同时他也采取一些措施，购进一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上架，冲淡色彩。学生没到书店，剩下刘先生夫妇自己经营，风波才暂时较为平息。

但反动派的进攻并没就此结束，残酷的迫害还在继续。1946年下半年，为学习和活动的方便，我和周乔林等几位同学借用泉州泮宫做宿舍。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保安队持着子弹上膛的枪，包围了我们的住所，一个带有国民党军少校军衔的反动军官身佩左轮枪闯入我们的宿舍进行搜查。他先进入我的宿舍，对我说：“他是国民党专员公署秘书，要来看看我们读的是什么书”。接着就动手搜查，先翻搜桌上的书刊，而且问我订什么报刊，並要我拿给他看。我坐着用手指对面椅上的大公报说，在那儿，他翻了翻，问我还订什么报？我说：“没有”。开我的橱柜反复搜查以后，又到其他同学宿舍搜查。我们平时就将党的文件和书籍收藏得很稳妥，

虽然当时有泉州地下党交给我们阅读的毛泽东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一部分党的整风文件以及一些进步杂志，都没有被搜到，结果他们扑空而回。深秋的一个夜晚，在下半夜一、二点钟在学生书店门口杀人，刘先生夫妇听到门外惨叫声。早晨开店门，门前一大堆鲜血，血溅书店店门。到了寒假，学校不再聘用刘独峰教授了，他夫妇二人只好靠那冷冷清清的书店为生。刘先生想回广州谋生，他的朋友告诉他不能离开泉州，一离开泉州境界特务就会逮捕他。

解放后有人告诉周乔林同志，特务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曾要逮捕他，但当时海疆学校的学生是受社会承认的“优秀分子”，怕动手抓了会引起社会公愤，证据又不够充分而中止。文革中我在华大被审查时，驻校军宣队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查到特务头子王介要逮捕倪章珣的名单。”

成立泉州学生委员会的前后情况

1945年，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所属的泉州地下党组织，在晋江县屿崆村开展工作，我家和周围邻居是据点之一。当时我还在海疆学校读书，党的干部郑秀治同志做了调查后，于1946年夏的一天同我见面，她向我进一步调查海疆学校的情况，觉得大出意外，对学校有那么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引起关注。而周乔林同志原是安海党组织计划发展的对象，但因同周熟悉的

同志都在被通缉之列，无法进入镇内和他联系，于是她向党的领导汇报后，泉中心县委负责人许集美、郑家玄两位同志先后通知我和周乔林同志在屿崆、泉州等地多次见面，让我汇报学习活动和学校情况，肯定和鼓励我们在学校的学习和活动，並布置我们进一步在学校开展工作。郑家玄同志还提供了许多党的整风文件，因我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十分强调要我们认真学习，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並先后吸收我和周乔林及其他同志入党。不久，东江党组织的同志也通知要吸收我们入党，这个通知比泉州地下党组织的决定迟了一步，我们已参加泉州地下党的组织。按上级领导的指示，我们不能再和其他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但是当时只懂得严守党的规定保密，不懂得想办法说明原因，就和东江党组织断了关系。

在我们找到泉州地下党组织以后，地委领导人许集美、郑家玄二同志直接领导我们，郑家玄同志和我们保持经常联系，要我们继续搞好学习活动同时开展工作。1946年下半年，在我们毕业以前，泉州地委书记许集美同志对我说：你们毕业后，各自在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厦门一带，找个工作做掩护，隐蔽开展工作。周乔林、吴联福、侯默纯、戴振芳和我，都按各自的条件在这一带的中学，以做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吴序阳先到福清